

THE
HIDDEN
LEVERS

关于财富和成功的观察与思考

250+ YEARS
AND THOUGHTS
ON FORTUNE AND
SUCCESS

隐藏的杠杆

文化经营者的第一考\闲暇乃灵感和创意之母\撬起整个世界——疯狂但合逻辑

王业群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LEVERS

OBSERVATIONS
AND THOUGHTS
ON FORTUNE AND
SUCCESS

隐藏的杠杆

关于财富和成功的观察与思考

王业群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藏的杠杆 / 王业群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6.7

ISBN 978-7-5057-3757-0

I. ①隐… II. ①王… III. ①文化产业—文集 IV. ①G1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9071号

隐藏的杠杆

YINCANG DE GANGGAN

作者: 王业群

责任编辑: 张蕾

特约编辑: 陈阳

装帧设计: 唐薇

技术编辑: 邹胜利

出版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福圣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32 5印张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7-3757-0

定 价: 29.80元

前言

Preface

人这一生，有很多事情其实经常是自己无法选择的，除了一样东西可以例外，那就是你的态度。故此，如果说我现在对经营——特别是有文化内涵的经营活动，已积累了一定程度自由应对能力的话，也几乎可以说是得益于机缘因素，否则很可能我早已经将自己的很多努力，投掷在了其他方向。

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退伍到省级电影公司已经10年之后，上级出于培养干部的考虑，动员我进入与公司业务经营相关的岗位任职。一俟踏入这个领域，我便按照自己一向的风格，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十分热爱自己的岗位，并以非常快的速度掌握了它，自如地控制了它。虽然整个过程并不长，前后大约只有5年时间，可对我却十分宝贵，中间所得到的历练，恐怕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到的。简言之，它源于我一贯所秉持的态度。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自己真像是一块海绵，拼命地在吸收书本和实践方面的各种知识；又像初生牛犊一样，对任何问题都敢于设问质疑，颠覆过往认识。即使商界习用

“上帝”指称客户及消费者，以表示敬畏之意的说法，自己才刚刚登场，就提出了挑战性观点，认为凭借市场操纵者之手，完全可以事在人为地牵引这个“上帝”，甚至按自己的意愿塑造这个“上帝”，以实现营销战略，而非只有被动的盲从。也正是凭着这股子冲劲和蓬勃向上的精神，我先后在电影经营、商业广告和营业性艺术演出等领域，打了一系列的“漂亮仗”，有些在全国范围内都不失开创意义，成为日后我走向成熟，在产业领域越来越具有宏观驾驭能力的早期资源。

尽管后来我的工作岗位一再发生变动，最终没能实现“下海”愿望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但事业很重要的一部分，都一直和市场与产业相关，前期积累也就很容易形成铺垫，导致非常快地将视角瞄准到了文化产业宏观研究的突破层面，成了推动中国文化产业观念确立的最早期鼓与呼者，引发了随后国家在此方面一系列迅速而深刻的变革。

客观说，我在文化产业领域的不少论点，起初并不为很多人接受，有些甚至踩了“禁区”，如文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旅游产业有至关重要意义的论点，就逾越了当时业界所能够接受的程度。我秉承的态度是，不和人争辩，历史自有结论。我觉得，如此浅显明白的道理，讨论根本没必要，也是浪费时间。结果证明我没有错。因此，现在每当我去到国内任何一处承载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景区，看见

那里由于得到了科学规划和合理开发利用，旅游业蒸蒸日上的时候，穿行于熙熙攘攘的游人中间，我都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会心一笑。

在参与不少地方发展文化产业规划，和受邀帮助不少地方、企业谋划经营思路、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思想启发和方法论的讲究十分必要，就跟学习和其他创造活动一样，它是获得成功与效益的最重要途径，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我产生了将自己在这方面观察和思考的所得，写成系列文章进行发表的想法。恰好这时机缘又到了，在朋友的牵线帮助下，我得以创办了一本专业刊物——《文化产业前沿》。这本小书所收集的，正是我3年多来在这份刊物开设的专栏上发表的文章，它立足于文化产业，却不局限于文化产业，基本涵盖了在财富和成功追求的道路上，我认为一个人需要有所思考、有所准备的各个主要方面。

和很多这方面内容书籍的不同之处，是本书既非那种从头到尾都体现严谨理论探讨的文字，也非那种类似课堂读本的做法，开列许多具体措施细则，供读者逐一遵循效法，似乎只要这样做了，就可以成功，甚至不惜列出习题、布置作业。我的文章没这个本事，它只想尽量做到有一些说理，有一些分析论证，更主要的是想有作者自己的体验和观点渗透在其中，体现的是作者自己的东西。如果能于其中偶尔一两个方面获得读者的认同，我就自觉幸运了，

不敢有太多奢望。因为说到底，财富和成功，不是纸上就能够得到的东西。

本书文章在陆续发表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人的鼓励，有非常熟悉的朋友，也有并不相识的人；包括陌生读者在连续读到此专栏文章后，兴奋得从千里之外给编辑部打来电话表达感受的事，每每都让作者受宠若惊。在此，我要对所有这些人，尤其是一直关注并热情鼓励我的人，表示自己深深的谢意；对花费心血，给本书出版提供了很好指导意见的编辑，也一并表示谢忱。

著者

2015年12月于广州

目录

Contents

也说中国 **为什么** 出不了比尔·盖茨 001

文化经营者的第一考 011

文化的淡泊与宁静 022

深巷之中 **飘酒香** 028

越是不熟悉越可能成功 034

秀才不出门，可知 **天下事？** 040

市场是载舟之水 045

人才 相对论 051

纠结抑或宿命：离成功只差一步 058

从天赋到财富 062

闲暇乃**灵感**和创意之母 071

再说闲暇 079

哲学：最“不堪实用”的**制胜之道** 086

细节在什么地方需要放大 097

第六感——直觉获益的微妙 104

撬起整个世界——**疯狂**但合**逻辑** 111

天下之难，作于易 120

东风不**与**周郎便 128

书中没有黄金屋 135

性格决定命运 146

没有个性，就不会有真实性。而社会普遍奉行双重价值判断标准，正是个性得不到张扬的另外一种表现形态。双重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蒙面性”。

也说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比尔·盖茨

这是借了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我多次注意到刘先生见诸于报刊谈论中国教育问题的文章，感到他能直陈中国教育界的种种弊端，文章观点鲜明，言辞尖锐犀利，有一定震撼力。在最近一篇《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比尔·盖茨》的文章中，刘先生归结的主要原因：一是“唯名论”作祟；二是“唯学历论”误导；三是缺乏冒风险的精神，应该说，分析的目光也是比较独到的。因为是谈到了全世界家喻户晓的人物比尔·盖茨，我就想谈谈我自己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必须肯定，全世界各国，没有不希望自己国家能出比尔·盖茨的，无数人的梦想之一，也是希望自己能成



比尔·盖茨，企业家、软件工程师、慈善家、微软公司创始人，曾从哈佛大学退学。连续多年被《福布斯》评为美国富翁榜首富。

为比尔·盖茨式的风云人物。将这个问题搁在中国发问，其潜台词无非因为中国乃人力资源大国，经济发展也比较迅速，理应能出比尔·盖茨，但是，中国又似乎最难出比尔·盖茨。

这是为什么？其实这就跟刘道玉先生多次抨击到的中国现行教育体制机制的弊端有关。只不过，我的看法和刘先生有所不同，我从来不认为中国教育上的问题，是仅从学校和教育部门中就可以找到或找准的。中国教育问题存在的种种弊端，在我看来，真实的病根子，其实都不在校园内和教育系统中，而在社会上，是整个社会对教育的认识发生了偏差。多年前我曾发表文章，谈过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我认为中国教育顽疾之所以难拔除，主要就是在现今中国人的价值观中，从上到下，普遍都在实行着双重价值判断标准。一重是信誓旦旦对外的，道理性的；另一重呢，才是真实的、现实的，是私下之说，内心之言。比如，讲大道理和做动员时，人人都可以说读大学不是唯一出路，不要把分数和升学率看得太重，选用人才不应唯学历论，但在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期待时，考大学读名校，却几乎可以肯定说是所有家长的不二选择，学校在衡量教学成绩时，分数和升学比率就是硬指标，单位在录用人员或选拔人才时，学历也是主要门槛，而不看对象是否有真才

实学。在中国，读大学就是奔就业，就是脱离现实环境的桥梁和跳板，这是社会的真实境况。所以，尽管人人都在呼吁教育改革，但人人都不得不被现实套牢，问题也就这么简单。在社会普遍实行双重价值判断标准的背景下，中国教育上发生的问题，早已经不在教育本身了。

因此，每当我看到在中国，无论大、中、小学，把无数学生家长、亲属都紧紧牢笼其中，让他们倍感纠结、痛受煎熬，看到每逢高考，报纸整版整版刊登学生在考场考试、家长在场外翘首等待的消息、照片，整个社会为之表现出的一种格外焦躁时，不知怎的，我就会有一种不安，甚至不祥的感觉。直觉告诉我，这种情况绝不是好事！什么时候，我们中国民众对教育有了平常心，对成功有了平常心，我们的教育才会有希望。否则，我相信换了谁做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在这个强大的现实潮流面前都会犯难，或犹豫踌躇、裹足不前；或谨慎小心、漫步徐行，不停止脚步，也不贸然出头。教育是什么，教育最根本的目的在哪里，教育目标和社会的价值目标取向是否吻合一致，在这些大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厘清的情况下，教育就改革论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我想起了20世纪初期的燕京大学，它的首任校长，就是毛泽东著作中点了名的美国人司徒雷登。据《燕大文



司徒雷登，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他为燕京大学制定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表达了他重视思想和学术自由的教育理念。图为司徒雷登和中国女孩在一起。

史资料》第21辑载，1934年他从美国回来时，正值对国民政府要求抗日的学生请愿活动，他对迎接他的人问的第一句话是：“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当听到的回答是肯定时，他说如果发生这样的爱国大事，燕大学生不参加，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这是一个美国人，在当中国大学校长时，对教育成功与否所做的判断，令当时所有在场的人无不钦佩。抗战全面爆发后，许多大学不得不迁往内地，也是这个司徒雷登，在听了同事以耶稣传道并没有离开罗马的治下，结果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例子劝说之后，毅然决然做出燕大不迁、原地坚守的决定。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多顽强的操守啊！为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被日方软禁，失去自由长达3年半的时间。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比尔·盖茨？这个问题问得好。刘道玉先生自己在文章中也说到，在哈佛大学这种世界排名第一的名校，比尔·盖茨读了两年就辍学了，不仅他，被称为“盖茨第二”的神奇人物马克·扎克伯格，也是读了两年就辍学了。刘先生借此提得尖锐：试想一想在中国，如果不是因病休学，有谁会退出被认为是“黄金般的学业呢”？

这一句话算是点到了我们的穴位。我们不妨继续问下



马克·扎克伯格，Facebook的创办人，被人们称为“盖茨第二”。哈佛大学计算机和心理专业的辍学生。

去，假使有一位学生想退出已考读的名校，但在家长和社会的压力下，他能有勇气做出这个决定吗？回答肯定是不能。所以，在一个连按个人意愿做选择的想法都不能得到支持的社会环境下，又怎么可能有敢于辍学的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呢？当然也就不会有辍学后创业成功的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了，这像是一个偷懒的，但却是简单明了的逻辑推演。

记得刘先生在另一篇文章曾激愤地喊道“哲学死了”不由也让我想到尼采说过的另一句话“上帝死了。”其实，

与其愤青似地说“上帝死了”，还不如伏尔泰说的“如果没有上帝，也要捏造一个出来”更实在；与其愤极而言“哲学死了”，维特根斯坦形容的“哲学家们使用的语言似乎已经被窄小的鞋子挤得变形了”的说法，于现实更确切。教育问题不是不能更正，而是要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把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主要靠什么去培养人的问题突出出来。“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古之智者对教育的目的说得非常清楚了，教育，首先是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是培养学生追求真理的高尚品质和独立人格。可我们的社会究竟发生什么问题了，以至在这个最根本的道理上深陷泥淖而不能自拔呢？

我经常对企业人士说的一句话是：经商，最高境界不是人去找钱，而是钱来找人。这其实不是一句漂亮的空话，更不是在忽悠人。因为这里面反映的是一个经商者在事业、人生理想和财富追求二者之间的态度取向，它们会直接影响到经商的层面高度。“不是人去找钱”，说的是要为事业而不是单纯为追求财富，这是出发点；“钱来找人”，说的是事业成功导致财富超速积累，这是结果，甚至是当初意想不到的结果。整天想着发财的人，有时就是发不了财，这被事实证明是商界表现出来的一般规律。国外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许许多多商界精英巨富，如果问他们创